

论三国荆州之争 ——再评诸葛亮

薛 国 中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薛国中(1929-), 男, 湖北巴东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

[摘 要] 东汉末年, 荆州这个重要地区, 为曹操、孙权、刘备三大军事集团所争夺, 以至于公元208年发生赤壁之战。曹操败于孙刘联盟, 而最后取得荆州的是孙权。刘备的失败, 是由于诸葛亮战略错误所致。

[关键词] 荆州; 诸葛亮; 赤壁之战; 隆中对

[中图分类号] K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4-0517-06

汉末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 是在汉献帝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以后形成的, 赤壁之战的焦点是争夺荆州。这场战局虽以曹操失败、其主力退回北方而告终, 刘备得意地据有荆州江南四郡, 孙权则所得无几。然而, 整个荆州归属仍是决定孙权与刘备发展前景关键之所在, 孙刘两大集团为荆州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刘备占有荆州, 是诸葛亮在其著名的《隆中对》里作为十分重要战略方针提出的, 也是在他的辅助下取得的。13年后即建安二十四年(220), 又因诸葛亮的错误而失去孙吴, 并导致关羽被杀, 刘备的帝业终成泡影, 可说是“成也诸葛, 败也诸葛”, 为后世所叹息。成败的关键在于对荆州战略价值的认识。

一、荆州的战略价值

荆州位于中国中部, 长江中游, 地域广阔, 汉代分为八郡, 长江南北各有四郡, 主要包括今两湖地区及河南南部。迄东汉以前, 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重心在北方。在近代工业兴起之前的农本时代, 人口增长能标志社会经济发达状况。西汉王朝的行政区划, 全国包括司隶(京畿)在内共十四州, 从户口数量来看, 梁方仲教授据《汉书》和《后汉书》统计, 最大的州郡, 人户在百万以上、人口在五百万以上者, 都是位于中国北部的五州郡, 即司隶、豫州、冀州、兖州、徐州。其后, 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东汉晚期, 上列北方五州, 除豫州外, 其余四州人户大为减少, 而南方的荆州、扬州、益州则户口大增。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 荆州从西汉668 597户升至1 399 394户, 从3 597 258口升至6 265 952口, 较西汉户口几增一倍, 仅次于益州^[1](第14、23页)。汉末黄巾军起义之后, 接着地方割据军阀相互兼并厮杀, 北方社会动荡不安, 此时南方相对而言, 比较安宁。北方士民纷纷南逃避难, 其中众多来到荆州, 不少有识之士聚集于襄阳。曹魏的荀彧说:“关中(陕西地区)膏腴之地, 顷遭荒乱, 人民流入荆州者, 十万余家。”^[2](卷63)于是, 荆州地区的经济文化更加发达起来。

东汉末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荆州刺史王叡为长沙太守孙坚所杀。汉献帝以刘表为荆州刺史。刘表就任之初,荆州境内也不宁静,“时贼纵横,道路梗塞”。刘表采纳谋士蒯良、蒯越、蔡瑁等人的意见,行仁义之道,获得成功,并把治所(首府)由江南的汉寿(位今湖南)迁到江北的襄阳^[3](卷59)。建安三年(198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畔,表遣兵攻围,破羡,平之”^[3](卷74下《刘表传》)。刘表在荆州为时12年(公元190—208年),政绩卓著。史载他“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恰,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蔡母闾、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3](卷74下《刘表传》)。禰衡是当时的一介名士,不为曹操所重视,横加侮辱。“刘表及荆州士大夫服其才名,甚宾礼之,文章言议,非衡不定。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并极其才思。时衡出,还见之,开省未周,因毁以抵(掷)地。表怵然为骇。衡乃从求笔札,须臾立成,辞义可观。表大悦,益重之”^[3](卷80下《文苑·禰衡传》)。刘表并不是贪财之辈,“在荆州几二十年,家无余积。”^[3](卷74下《刘表传》)

总之当时荆州是全国最好的地方,自然为一些政治风云人物觊觎垂涎,从而成为军事上必争的战略要地,更是曹操、孙权、刘备三大军事集团争夺的焦点。

二、曹、孙、刘荆州之争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后,曹操便把目光投向荆州。建安八年八月,曹操听从谋士郭嘉“南向荆州”的建议,“击刘表军于西平”(位今河南叶县东,属豫州汝南郡)。因顾忌袁氏兄弟勾结乌桓(当时中国东北胡族的一支)袭其后,乃停止继续南进^[2](卷65)。直到建安十二年袁氏三兄弟相继完全消灭之后,才正式实施其争占荆州的计划。曹操深知,争夺荆州,刘表不是他的对手,最强有力的对手是东吴孙权集团。孙吴的实力是水军,于是曹操于建安十三年正月在其首府邳城(位今河北南部)“作玄武池以肄(习也)舟师”,即训练水军作与孙吴决战的准备。同年七月出兵“南击刘表”。九月军至新野,进逼荆州首府襄阳。时刘表已病逝,其子刘琮举州降曹,曹操遂首先占据了襄阳,接着又占据了储有军械粮草的江陵,并收纳了刘表集团的文士武将如蒯越、邓羲、文聘、蔡瑁等人。曹操大军与孙吴隔江相望,向孙权送去的战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2](卷65)就是说,他要与孙权进行决战。曹操的气势使孙权和刘备都惊惶失色,共同商议对敌之策,确定孙刘联合同抗曹操。在这方面,诸葛亮起了积极的重要作用,遂有名著史册的赤壁大战。曹操万万没有料到他在这场战争中大败,荆州得而复失。一般都认为曹操的失败是遭到孙吴的火攻战术。此只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曹军中流行瘟疫,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大战失败,曹操率主力北归,留曹仁据守樊城,结束了荆州之争的第一幕。以后虽没有见他再有夺取荆州的言论和行动,但荆州在他心中的地位仍旧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闻(孙)权以(荆州)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4](《吴书·鲁肃传》)。

孙吴之图荆州久矣,从孙坚、孙策到孙权三世,不断进攻荆州,力图吞并。建安十三年初,原依附刘表部属黄祖的甘宁投奔孙权,并献策曰,“南荆之地,山川形使,诚国之西势也,当早图之,不可落后于曹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据樊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关”。同年八月,刘表病逝,鲁肃闻讯,“言于孙权曰,荆州与国邻接,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甘宁和鲁肃的战略思想,把夺取荆州的意义大大提高了,所以“权深纳之”,更加激励他们夺取荆州的积极性^[3](卷65)。随后与曹军进行的赤壁大战,对孙吴来说,其重要性不仅是抗击曹操的入侵,更是志在夺得荆州,为以后建立帝业奠定基础。赤壁之战,孙吴是主力,为大败强敌曹操做出最大的贡献,然而刘备集团却乘胜抢占了荆州江南的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获得最多的胜利果实。孙权集团只得到江北的两郡,乃“以周瑜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程普领江夏,治沙羡(今武汉金口)”^[2](卷66),其余南阳、章陵两郡还在曹操集团手中,当然不甘心。这就是后来孙权与刘备矛盾日益加剧原因之所在。

刘备在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以镇压黄巾军起家,而实力不大。其后在大军阀之间东奔西投,也被撵得东流西蹿,清初王夫之形容他处于“飘零屡挫。托足无地之日”^[5](卷九,二五),最后于建安六年九月,在曹操的追赶下,投奔到荆州,依附刘表。史谓:“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益多,表疑其心,阴禦之。”^[4]《蜀书·先主传》)不仅刘表“憚其为人,不甚信用”,荆州文士、武将如蒯越、蔡瑁等人,还欲借宴会之机把他除掉^[4](《蜀书·先主传》注引《世语》)。刘备虽有占有荆州之心,却不得不小心谨慎,切戒轻举妄动,极力争取荆州官民的支持。刘备在荆州最大所得,是襄阳名士司马徽为他推荐了两位识时务的俊杰,诸葛亮与庞统。尤其诸葛亮,为他提出创建帝业的战略总方针,即著名的历史文献《隆中对》(原文略)。《隆中对》的要点有三:第一、刘备目前势单力薄,不足与曹、孙抗衡,只能联孙抗曹。第二、迅速先夺取荆州,再取益州,建立自己的地盘。第三、仿照肇建汉朝的刘邦,以益州为根据地,刘备自率主力进据汉中,越秦岭,占甘陕,出潼关,图中原;同时以上将率荆州之军为侧翼,夹击曹操,到达统一全中国,成就帝王霸业之目的。刘备在诸葛亮的策谋和辅助下,取得节节胜利。

赤壁之战刘备借孙吴之力战败曹操,抢先占领荆州江南四郡,并自领荆州牧,治所设于油口,改名公安,积极部署,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以张飞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原刘表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範、零陵太守刘度均降刘备而留任,后以赵云代赵範。以关羽为盪寇将军,预领襄阳太守,驻江北^[3](卷65)。他还不满足,建安十五年“乃自诣京(京口,今镇江市)见孙权,求都督荆州”。考虑到曹仁尚屯兵樊城,北方的威胁不可轻视,孙权在鲁肃劝说下以荆州借与刘备^[2](卷66)。所谓“借荆州”的历史公案便因此而产生了。清代学者赵翼认为“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还作了详细论证^[6](卷七·“借荆州之非”)。其实不然,“借荆州”之言见于晋人陈寿《三国志·蜀书·鲁肃传》,南朝宋人裴松之为此注引《汉晋春秋》亦云:“吕範劝留备,(鲁)肃曰:‘不可。……(孙吴)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勿论陈寿著《三国志》还是裴松之注引晋人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离三国时期均不过百年,他们不会毫无根据而妄下断语,此其一。其二,刘备所借的“荆州”并非全荆州八郡,何况他已占有本属刘表的江南四郡,无借字之可言,而且江北的南阳、章陵两郡尚为曹仁占据,非孙权所有。其欲“借”者荆州南郡也,治所江陵,后称荆州。刘备意在江北四郡,欲先取江陵为立足点,得寸进尺,步步为营,实现其据有全荆州的计划。南宋胡三省一语道破:“刘备又欲兼得江汉间四郡也。”^[2](卷66)孙权绝对不会将南郡拱手礼让,刘备意识到若以武力夺取,与孙权必有激战,曹操则乘机南下,坐收渔利,故只能以“借”得之,名借实占。刘备在借得之后,立即遣关羽率军进驻江陵。这是荆州之争的第二幕;然孙刘之争至此远未结束,往后会更加激烈,终致兵戎相见。

刘备既占有荆州大部,算是站稳了脚跟,应该西取益州,实施其第二步战略方针。

益州自汉灵帝(168—188)以来江夏竟陵(湖北天门)人刘焉、刘璋父子相继为刺史。据扶风人法正说,益州“自焉以来,……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3](卷67)。益州有为之士早已不满,闻刘备欲进西蜀,争相投从,其中称著者有张松和法正。法正为刘璋军议校尉,张松为益州别驾,二人均不受重用,且认为刘璋不足与有为,刘备有雄略,乃共同密谋奉备为州主。这正是刘备进取益州的大好时机。据韦曜《吴书》说,刘备也曾见张松,详细询问“蜀中关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等情况^[3](卷66注引《考》)。建安十六年十二月,法正至荆州,阴献策于刘备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之股肱,响应于内,以取益州,犹如反掌。”^[3](卷66)当刘备尚在犹豫不决时,庞统进言道:“荆州荒残,人物殫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4]《蜀书·庞统传》引《九州春秋》)。在众多人的激励下,“备以为然,乃留诸葛亮、关羽等守荆州,以赵云领留营司马,備将步卒万人入益州”。同行的还有庞统。刘备大军到达离成都只有360里的涪陵,刘璋率步骑三万余人“往会之”。张松、法正、庞统均主张借此时机扣压刘璋,一举夺得益州。刘备曰“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2](卷66)刘备一向很

注意人心向背。早在赤壁之战前夕,刘琮在襄阳欲举州降曹时,诸葛亮等劝他立即攻占襄阳。刘备以“刘荆州(表)临亡託我以遗孤,背信自济,吾所不为”为托词而拒绝,实际是顾忌荆州士民不服,难以立足(事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及《资治通鉴》卷65)。刘璋资他以兵马给养,使击汉中的张鲁。他却屯驻葭萌(位四川广元西南),拥有“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3](卷66),等待时机。建安十七年,在庞统的催促和策划下,“还兵南向,所在皆克”^[4](《蜀书·刘二牧传》)。十八年夏进围雒城,庞统中流矢而卒。十九年五月围攻成都,刘璋开城投降,備自领益州牧^[2](卷66,67),其夺取益州的计划完成了,诸葛亮提出的总战略目标也实现了。

刘备胜利进军之际,“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泝流,克巴东,至江州,破巴郡”,与刘备会师成都城下。克城之后,“以军师中郎将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2](卷67)。应该说诸葛亮率大军入蜀,是不必要的,错误的。第一,刘备在益州的军事实力充足,进展比较顺利,用不着从荆州调兵增援;况有法正、张松等为内应。清初学者王夫之评论说:“取蜀之事,先主(刘备)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诸葛亮)也”^[5](卷九,三五)。第二,益州在刘焉统治时,“杀州中豪强十余人”,刘璋又“性柔宽无威略,州人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士民对他们父子早已不满。刘璋自己也承认:“父子在州二十余岁,无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战三载,民膏草野者,以璋故也。”^[3](卷75《刘焉传》)刘备兵临城下,开城投降,势所必然。第三,刘备进军西蜀围攻成都时,曹魏进入关中的军队被韩遂、马超、张鲁阻止在六盘山以东、秦岭以北的汉中原。诸葛亮等大军溯江西上的第二年(215年),曹操才占据汉中,部将劝他乘胜进军益州,他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3](卷67)而且视汉中为“食之无所得”的鸡肋,只留赵颙等固守,“迁其民于关陇”^[7](《汉中志》),自率军东归,可见当时蜀地并无曹军自汉中入侵的威胁,此间倒是孙权开始了其夺荆州的行动计划^[2](卷67)。第四,调大军西进益州,必然使防守荆州的兵力减弱,易遭孙、曹袭击,入蜀军回援不及,有丢失荆州之虞,此乃军家大忌,为以后的历史所证明。

刘备在荆州尚未进军西蜀时,孙权采纳周瑜、甘宁等人取蜀的意见,以实现其早所拟定跨有荆益的远谋(见前文),遣使通报刘备,说他们要攻取益州。刘备以“同盟无故自相攻伐”为借口,极力阻止,并赶紧加强军力部署,“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位公安南)”,以扼守入蜀的长江要道。刘备取得益州后,孙权大怒,要求刘备归还所借的荆州(即南郡),又遭拒绝,于是决定以武力夺取刘备占有的江南地盘。建安二十年夏,孙权遣吕蒙督兵三万以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以拒关羽,他自己进驻陆口(今湖北嘉鱼陆溪口),节制诸军。“刘备闻之,自蜀亲至公安,遣关羽争三郡”^[3](卷67)。双方剑拔弩张,从而拉开了争夺荆州的第三幕。但是刘备毕竟是初得益州,人心未附,若远争江陵,恐曹操乘机取益州,于是“使使求和于权。权令诸葛瑾报命,更寻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備”^[3](卷67)。干戈暂息,但为时不久。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刘备占据汉中,进为汉中王。他没有按照诸葛亮原定计划越秦岭去夺取关中,而是向东发展,遣宜都郡(分南郡而设)太守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今湖北房县)。又遣养子副军中郎将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与孟达会攻上庸(属汉中郡,湖北竹山县境内)。显然,刘备意图把汉中与荆州连结成一片,以巩固荆益,形成对曹操的威胁。与此同时,关羽“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众攻曹仁于樊”。“羽又遣别将围将军吕常于襄阳。荆州刺史胡脩、南乡(分南阳郡而立,仍属荆州)太守傅芳皆降于羽。”^[3](卷68)正当关羽胜利进军得意之际,孙权遣陆逊、吕蒙抄了他的后路,袭取江陵,关羽败死于麦城(湖北当阳境内),全荆州终为孙吴所有。

三、夷陵之战与荆州之争

“大意失荆州”不是刘备之过,关羽要负一部分责任,最根本源于诸葛亮战略总方针的错误,《隆中对》包含着错误的因素。在诸葛亮心中,益州重于荆州,提出要刘备仿效刘邦,以益州为基地,走出秦川取中原的老路,“甘略定于此矣”(王夫之语)。在荆州与益州战略地位的认识上,庞统的意见可能与诸葛

亮不同,他在劝说刘备取益州时,只说“权借”,即暂且利用,而不是以此为根据地,言外之意,荆州是根本。诸葛亮是说“因之以成帝业”,则是以此为根据地,把荆州置于次要地位。荆州虽在曹操南下和赤壁之战中受到一些破坏,然其人文和地理条件远胜于益州,识时务的俊杰诸葛亮应该是清楚的;而且在当时荆州的地位极为特殊,它既是孙刘争夺的焦点,又是孙刘联合共抗曹操的结合点,绝对不可轻视,孙刘失和,只有利于曹魏,具有政治谋略并建立起孙刘联盟的诸葛亮,应亲自坐镇荆州才是正理。王夫之认为,“夫(刘)与吴在离合之间,……定孙、刘之交者武侯也,有事于曹,而不得开衅于吴。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赵)云与飞以守江陵。”^[9](卷九,三五)可是,在刘备并不需要时候,诸葛亮却离开荆州,率领张飞、赵云赶往西蜀,减少荆州的兵力,把维持孙刘联盟的重担撘给了关羽,此其错误者一。其二,由于重益轻荆,在对付曹操的军事部署上,把重兵放到益州,作为“正兵”,是正面对敌的主力。只留一支孤军屯驻江陵作策应,是为“奇兵”。这是轻重颠倒。王夫之批评说:“以形势言,出宛(河南南阳)、雒(洛阳)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刘备)自率大众出秦川,而命将向宛、雒,失轻重矣”^[4](卷九,二五)。当时形势是,曹操重兵在宛、雒,身负重任的军师将军诸葛亮,不应该让关羽孤军北进而终遭失败。第三,留关羽是诸葛亮的主张,《隆中对》云:“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雒”,在刘备军中,“上将”非关羽莫属。诸葛亮率军入蜀时,也是留关羽守江陵。若谓留羽有错,错在诸葛亮。关羽在战斗中确是一员虎将,在政治上则是个庸才,根本没意识到他在荆州有必须维护刘孙联盟的重大责任。关羽为人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藐视一切,据说他“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2](卷69),连诸葛亮也不放在眼里。他“数与鲁肃生疑贰”,“以忌诸葛者忌肃”^[5](卷九,三三)。多次激怒孙权。“权尝为其子求昏(婚)于羽,羽骂其使,不许昏。由是权怒。”关羽在樊城打败于禁的魏军,趾高气扬,不与东吴商议,“擅取权湘关米,权闻之,遂发兵袭羽”。他轻视其部将麋芳、傅士仁等,当他北征襄樊时,“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及,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惧”^[2](卷68)。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麋芳、傅士仁相继投降孙吴,丢失了荆州。从这一点看,王夫之所谓“荆州以失……关羽安能逃其责哉?”^[9](卷九,三三)是切中要害之言。

公元220年初曹操逝世,十月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自为皇帝。次年四月刘备亦称帝于汉中,以诸葛亮为丞相。六月,“汉主(刘备)耻关羽之没,将击孙权”。这时离关羽死已是第三个年头了。翊军将军赵云劝阻说:“国贼曹操,非孙权也。若先灭魏,则权自服。……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群臣谏阻者甚众。孙吴的诸葛瑾也致信刘备说:“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汉献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矣。”^[2](卷69),这些善意的劝阻均遭刘备拒绝。是年七月,刘备亲率兵四万南下向秭归进发。孙权一面遣军五万拒敌,一面向曹魏称臣,以求和好。显然,刘备的轻举妄动,促使吴魏和平相处,共敌刘备。公元222年,蜀军“自巫峡建平连营至夷陵界,立数十屯”,“自正月与吴相拒,至六月不决”。闰六月,孙吴年青将领陆逊在夷陵(今湖北宜昌)用火攻,烧蜀军四十余营,蜀军大败,刘备逃至白帝城,次年四月逝世于此^[2](卷69)。

征战多年、老谋深算的刘玄德,自然明了当时自己所处的不利形势,不会仅为一己之私情而冒险伐吴。其所以不听从赵云、诸葛瑾等众多人的规劝而决意大举伐吴者,并非完全为报关羽之仇,最根本的是要夺回荆州。《隆中对》清楚地说明,要兼有荆益才能终成帝业。如今荆州丧失,能不痛心,岂能甘心。诸葛瑾给刘备的劝说信中,不回避荆州问题,必话出有因。刘备出兵伐吴之际,曹魏的谋士刘晔把为关羽复仇列为次要原因,而首先说“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彊”^[2](卷69),此话含有刘备要以武力争荆州之意。夷陵之战可视为刘备争荆州的继续。蜀军在夷陵战败之后,诸葛亮惋惜地说:“孝直(法正)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倾危矣。”身为蜀中丞相的诸葛亮,刘备一向是言听计从,既知不可伐吴,当时为何不极力谏阻。责任所在而以法正不在世为遁词(法正逝于建安二十四年)。胡三省对此事的注文很妙,他说:“观孔明此言,不以汉主伐吴为可,然而不谏者,以汉主怒甚而不可阻;且得上流,可以胜也。”^[2](卷69《注》)这就是说,诸葛亮虽不以伐吴为是,却怀有侥幸取胜的心理而让刘备出兵,若夺回荆州,可补其重益失荆之误。

荆州丢了,刘备死了,闭关在长江上游的蜀国,由诸葛亮当家作主,鞠躬尽瘁,到公元234年逝世,苦苦支撑了11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廩实,器械利,黎和饶”^[4]《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政事井井

有条,不亚与管仲、萧何,堪称为杰出的政治家。然而在军事方面,虽对曹魏多次用兵,只是无奈之举,并无成就。“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4]《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清初刘献廷说,“孔明之出祁山,以攻为守者也。……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8](卷一)至今学术界还称诸葛亮为“杰出的军事家”,误矣,其实历史早有定论。晋朝陈寿评论说:“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4]《蜀书·诸葛亮传》又在《进诸葛亮集表》中说:“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幹,优于将略”^[9](第22页)清初赵翼认为“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9](卷六·陈寿论诸葛亮)张、陈、赵都不认为诸葛亮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北宋苏洵则点击要害:“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10]《项籍》)精于战略的毛泽东批评诸葛亮用兵的错误,指出:“其始误于隆中对”^[11](第336页)。苏、毛都是说诸葛亮犯了“重益轻荆”的战略错误。最后诸葛亮似有所悟,在上蜀汉后主书(即《后出师表》)中也承认“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4]《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重要历史人物是一个时代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在这个时代的历史舞台上,他们的言论行动必然会有得有失,有是有非,对他们的评价,应当实事求是,臧否适宜,既不可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更不可认为凡身居高位、声名显赫者必然是全智全能。对诸葛亮应如此,对任何人亦应如此,古今皆然。

[参 考 文 献]

- [1]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 [2]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3] 范 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4] 陈 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5] 王夫之. 读通鉴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6] 赵 翼. 廿二史劄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7] 常 璩. 华阳国志·四部丛刊初编·史部[M].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本.
- [8] 刘献廷. 广阳杂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9] 中华书局. 诸葛亮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10] 苏 洵. 苏洵散文精品选[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 [11] 陈 晋. 毛泽东之魂[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桂 莉)

Scramble for Jingzhou by Three States

XUE Guozhong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XUE Guozhong (1929-),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history.

Abstract: In the end of East-Han Dynasty, Jingzhou, the most important area of China, was scrambled by three great military groups which were CAO Cao, SUN Quan and LIU Bei. The scramble for Jingzhou leaded to Chibi war and CAO Cao was defeated by alliance of SUN- LIU in this war. SUN Quan group succeeded and finally gained the jingzhou. The failure of LIU Bei was owing to the mistake in the strategy of ZHUGE Liang.

Key words: Jingzhou; ZHUGE Liang; Long-Zheng dialog; Chibi war